

当代小说十论

谢有顺/作品

谢有顺 张鸣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评论卷

有价值的写作，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深渊给人；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检验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拷问另一个灵魂深处。

当代小说十论

谢有顺/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评论卷

学术策划与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小说十论 / 谢有顺著 .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4

(身份共同体 · 70 后作家大系 /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ISBN 978-7-5329-5364-6

I . ① 当… II . ① 谢… III . ① 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 ① 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9875 号

当代小说十论

谢有顺 作品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	---------------------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364-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尚待完成的批评变革

——关于“70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

孟繁华 张清华

“70后”这个命名，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个阶段，大约还是一个不明之物。因此，当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批评家提出之初，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对这个命名的质疑或不满，是晚近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当没有能力提出重大问题的时候，纠缠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实无必要。我们的意思是，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一代新人就这样矗立在我们面前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有依稀可见的共性。当要讨论这代人的文学批评的时候，使用一个有“通约”可能的概念也未尝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码三十多年来的文学概念，大多是临时性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实验小说”“小女子散文”“闲适文学”“文化散文”“女性文学”“海外文学”“离散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等，不一而足，哪个概念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作为切近的文学现象，谈到一个概念我们大抵知道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这便足矣。眼前的文学现象谁有能力一览无余一目了然呢？因此，与其纠缠于差强人意的概念问题，不如着力探讨一下其内部的问题。

这里要讨论的是“70后”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我们选择了谢有顺、梁鸿、贺桂梅、张莉、李云雷、张定浩、张晓琴、李丹梦、

郭冰茹、饶翔、霍俊明、王士强等十二位批评家，尽管他们的个人风格和研究路向各不相同，但大体可以展示出“70后”一代批评家的风貌与特点，以及与其他代际批评家的差异性。

“70后”批评家，基本都有高学历，在学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文学批评训练，对中西方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都很熟悉。这是他们从事文学批评的起点，也是他们与前几代批评家的不同。这一背景使他们一起步就具有了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掌握了十分专业的批评方法。他们看上去似乎很少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并未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共同体”，但是，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却使他们较多地保有了个人的批评风格和个性，这是他们的幸运。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并不意味着是书斋里的事业，它确实需要批评家对社会历史有更广阔和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性认知。“50后”“60后”一代批评家，或许早年所受教育有欠缺，读书的年龄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上山下乡”，但他们因此也有了更多对社会历史和国情的切近认知。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文学时，能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展开批评活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除了那时的历史语境使然，与这代人如上所说的背景也不无关系。80年代的社会批判和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体现了这代人的价值观和关注问题的方式方法。相形之下，从书斋走出来的“70后”批评家，则不大可能是怀着这样的情结来进入批评工作的。

然而，作为代际，我们或许也真的无力来概括他们更多的共同性，如果说“70后”作家的创作还有着某些可探查的共性——比如经验的碎片化、历史记忆中公共性的消失、叙事美学上的琐屑化，等等，在“70后”批评家这里，则除了年代的相同，而并无太多的共同性。所以，与其勉为其难地去归纳，不如分别来谈谈他们的一些个性。事实上，“70后”批评家由于他们的出身背景和个人价值目标的不同，确乎表现出了

比较鲜明的个人特点。

就批评立场看，李云雷或许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例。他出身于农村，因此对乡村和底层生活的关注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底层写作”这一仍存争议的文学现象，在李云雷那里获得了不懈的支持和肯定。他说：“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①他在注重文学审美标准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学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支持先锋前卫探索的同时，更注重对传统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在密切关注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时候，也注意从其他艺术形式中看到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和同一性。因此，李云雷的文学批评不仅与当下文学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他的文化“左翼”的情感色彩，使他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介入意识，也使他成为维护这个时代底层写作最具活力的声音之一。他迅速地站在了文学批评的前沿，与他一直坚持的底层情怀大有关系。

在批评实绩方面建树比较突出，且与上个年代的批评家之间有更多

^① 李云雷博客：《略谈我的文学批评》，2013年3月6日。

传承的，应该是谢有顺。某种意义上，他可算是“70后”批评家的一个例外。他成名的时候，他们这一代大多数的批评家还在校学习。少年成名的他也有过乡村生活经历，因此，在谈到影响他的人与事时，他说：“……更多的是一些渺小的人物，他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他们的内心却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比如我父亲的耿直和公正，我在福州时一些朋友的谦卑和纯粹，我在报社时一些同事的勇敢和敬业，等等。他们的存在，会构成一个不易觉察的精神气场，影响着你。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细微影响，有时比你的阅读和思考更加重要。”^①但是，谢有顺的出身背景似乎并没有与他的文学批评构成直接关系，他更关注的还是精英圈子，经典化程度高的一批作家，关注文学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但出身背景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面对当下的文坛，他曾引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他们不高兴。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这多少有些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不能说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无关。当然，有顺作为批评家留给人最多的印象，还是他活跃的身姿、过人的见识和才气，还有这代批评家文风中少见的诗意和老练。

如果要找一个“70后”学院派批评家的代表，或许还要数到贺桂梅。她在北京大学读书十年，留校任教后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批评家，但她的研究又一直与文学现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种身份，她可能更具历史纵深感，视野也更加宽阔。比如在谈到如何认识80年代的时候，她说：“90年代关于80年代的论辩，主要是在知识界内部展开的，而当前的80年代热，却是一个扩散到不同社会层面的话题。比如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现在对于80年代的想象和关注的热情，带有很强的‘怀旧’色彩。当80年代可以成为‘怀旧’对象时，就说明人

^① 姜广平：《“持志如心痛”——与谢有顺对话》，《西湖》2007年10期。

们意识到‘80年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可以站在一种新的关于现实的感知和对历史的重新确认的位置上‘回过头’来看80年代。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当然与当下中国经济‘崛起’，以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今天的‘80年代热’，是带有距离感的、对80年代的重新认知。如何认知80年代，也与如何判断、叙述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关。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崛起，有人认为这是‘告别革命’的结果，有人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80年代的改革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又比如，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阶层、阶级分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80年代的‘民主’诉求没有被实践，而有人则认为需要在批判80年代西方式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涵义等等。”^①这只是贺桂梅大量论述中的一个例子，但从中可以看出，她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是综合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一起提出来的。但是，它又没有离开当下中国的问题场，并且仍然是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70后”一代，有如此宽广的视野，实属不易。

另一个学院派出身，但却被称为“反教条主义”批评家的例子是张莉，清晰、准确和敏锐是她的特点。良好的学术训练并未使她变得迟钝，相反，她介入现场的反应却是更加机警和迅速。她自己说，在读研究生的七年时间里，“大都在图书馆里度过。从研一开始，我每天都去清华旧图书馆翻《新青年》《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在北师大也一样，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去翻看民国女校教材，各种民国教育杂志，从早晨到晚上。这些阅读是写论文的必备功课；但有些阅读，比如研一用半年时间做萧红研究，读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传记；还比如研二去北大图书馆翻

^① 贺桂梅：《重返80年代，打开中国视野——贺桂梅访谈录》，见《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代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创刊以来的《文艺报》等是兴趣使然。我很庆幸自己当年兴趣芜杂，这使我日后谈论很多问题时有基础，对百年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①这样枯燥的学院训练，为日后一个批评家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莉的女性文学研究、孙犁研究、新锐作家的批评等，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如果谈到对80年代以来海派的“才子派批评”的传承，张定浩又是另一个例子。既写诗又研究孟子，确乎使他的文字有了更大的张力，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行使批评职能之时，他既没有诗人的缙缙犹豫，也不像从故纸堆里走出的老学究，而他的雄辩又确实没有辜负对孟子的研究。他的批评锋芒在当今批评家里罕有匹敌，他的直言不讳肯定会让一些作家心有顾忌。他在评论余华的《第七天》时指出：“闹剧式的叙述是余华的擅长，但在这样的闹剧中，能干是用‘有房有车有钱’来体现的，情绪是用哭闹和跳楼来表现的，夫妻和好是用下跪和打自己嘴巴来实现的，小说家得是看了多少狗血电视剧和网络小说，才能有勇气忍受这样老掉牙的架空设计？无论《第七天》的叙述者是生者还是死者，这都不再是小说，这是丧失了一切想象力和对生活细节的记忆能力之后的，属于活人的平庸。”不仅如此，张定浩还对《第七天》的某些评论也提出了批评：“因为《第七天》中描述了飘舞的雪花，有人就诗意地联想到乔伊斯的《死者》；因为《第七天》有对权力腐败的表达，有人就敏感地攀附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这些人应该好好再去读读乔伊斯和奥威尔，去看看对现实生活的爱和恨是如何在那些杰出小说家笔下诚实地纠缠在一起，去听听那些自由灵魂的生动对话，去感受那真正的悲悯，还有满怀敬畏的同情。”^②这样的评论，观点或许还可讨论，但足以见

① 周明全：《理想的批评环境应众声喧哗——访谈“70后”著名批评家张莉》，《西湖》2013年6期。

② 张定浩：《〈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见《批评的准备》，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出批评家的人与个性，不是那种中学老师批作文式的批评。它在切入文本内部的同时，通过更广阔的视角，与批评对象展开了真正的批评与对话关系。

此外，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的梁鸿对河南作家的研究，李丹梦对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张晓琴对生态文学和当下热点文学现象的研究，霍俊明、王士强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研究，郭冰茹对当代中国小说叙事的研究，饶翔对当下前沿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批评等，都展现了不同的视角、风格和才情，在当代批评的不同向度上各有建树。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从事文学批评的全部困难要远大于八九十年代。因为那个年代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是有可能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到处积满了问题，而且处理起来也相对简单些。到“70后”这代批评家，他们面对文学或文化的问题时几乎是进了无物之阵。不要说提出问题，即便是对一个事物的命名都显得格外困难。如果我们对“70后”一代批评家期待过高，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公平的。试想，“50后”“60后”批评家在这个时代又有怎样的作为呢？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困难……这些关乎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以及新闻和非虚构文体等对阅读和眼球的争夺，再加上学院学术制度、评价制度、项目制度等对学院批评家的制约困扰等，使文学批评更加步履维艰。因此，我们除了承认“70后”批评家尚未完成文学批评变革的现实外，还应该对这一代批评家怀有同情和敬意。

2016年9月，北京

目录

前言：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1
一、作为一种伦理的叙事	7
二、叙事时代的来临	54
三、革命与叙事	78
四、个体叙事的演进	107
五、叙事与身体	124
六、内在的人	135
七、善与希望的发现	157
八、恶与苦难的哲学	179

九、欲望的谜语		202
十、感觉的象征世界		216
余绪：人心的省悟		238

前言：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辟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要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

要谈文学的时代性，我以为这是个核心问题。谁都知道，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只从文学本身看，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任何技术性的或者片断性的变革，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

这场变革，我以为，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培育灵魂，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都是有立场的，所谓生命的立场——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达，“温柔敦厚，诗教也”，“思无邪”，说的正是作家中正的性情。以生命，通

性情，自内而外，故中国文学也被称为“心学”。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①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以此观点看中国文学，就会明白，何以中国一直来唯诗歌一脉发达，小说则被贬为“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文人历来重一己性情之表达，而轻虚构、描摹实事这一写作路径；文字中要见作者的内在心情（诗歌尤其如此），而非去伪造他人的心情（小说近于伪造）；写作是为天地立心，而非放心（把心放于外，只见事事物物，不见生命和性情）。至五四以后，讲科学民主，文化界涌动着一股求事功的暗流，但求事功者，又未必有事功的精神，所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缺乏超越精神，它不关乎新的文化理想的建立，更不接续中国固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这样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

文学一旦只求事功，对生命的荒凉没有感觉，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自然和经验，背后关涉的是一种趣味——写作和生活的趣味。这个趣味并不俗。所以，描摹自然实事，书写“经验的我”，一直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这在当时是一种解放，它弥补了中国文学重性情流露而不及物的局限，使文学有了及物精神。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还只玩赏一种写作的趣味，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因为除了自然，还有人文，除了“经验的我”，还有道德的我、理性的我。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不从生理和身体的生命里超拔出来，不讲道德勇气和超越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

精神，作家就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由此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一直沉溺于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的文学，这些年来不过是在延续着量的增长，而无多少质的改变。

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后面对应的正是量的精神，是纷繁的事象，是欲望和物质在作家笔下的疯狂生长，是每年几千部长篇小说的泛滥性出版。而所谓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则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没有多少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因为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唯有价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以前讲文学，多注重讲写法，讲经验世界写得如何活泼、真实，仿佛文学只关乎这些，而无关道德和价值。现在看来，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文学如果不能从生命、灵魂里开出一个新的世界，终究没有出路。

现代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命黯淡，灵魂无所归依，但今日的文学无视这些惨淡的价值事实，只一味地去迎合那些事功层面的趣味，没有气魄张扬一种超越精神，更无法坚持有方向感的灵魂叙事，为心灵内在的力量作证，那个被欲望、物质闷了多年的生命如何才能翻转过来？

因此，现在是到了重申文学的精神立场的时候了。有立场，才有理想；有理想，才有担当和肯定。“现在这时代本很紧张，但大家却闷在这里。究竟所以如此，即因无理想。……如有理想出来，即可成大事功！”^①确实，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自恋于一个小世界，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用强用狠，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说穿了，都在用文学混世界而已，唯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

^① 牟宗三主讲、蔡仁厚辑录：《人文讲习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批评也是如此。面对一片狼藉的文学世界，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从前郑板桥曾说：‘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我们现在写文，要以此存心，以此落墨，才不伤自己，不伤家国。假使写文的人没有尖酸刻薄的心，则天下就好了。”^①除刻薄之风盛行，批评中言不及义的文字也很多，追问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专业精神，无从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荡、饱满；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没有生命理想。

要说“先立其大”，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以前，说到立场和理想，仿佛是一个酸词，现在我则愿意大胆、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只有精神饱满了，才有可能对时代的萎靡作狮子吼，把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提振起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即方正，到了这样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时代，更需要一种大方大正的精神，把文学从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来。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萎靡、低矮的样子，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有文化理想，也有道德心灵的勇气，从内在精神上说，他们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径直而行的路。现在，肯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自然，肯担当、有气魄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① 牟宗三主讲、蔡仁厚辑录：《人文讲习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因此，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在生命上，没有多少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变应万变。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这是一种精神气魄。